

從模仿到創新的百年探索 旅程——中國學前教育改革 進入新的戰略調整期

霍力岩* 李敏誼**

摘要

中國學前教育現代化走過了一百多年的發展歷程，其中經歷了四次大規模向國外學習的浪潮。第一次是清末新政啟動的「師法日本」，學習日本福祿貝爾式幼兒園的理論與實踐，第二次是國民政府時期實行的全盤「美化」，模仿美國幼兒園並嘗試結合本國實際探索科學化的改革道路。第三次是新中國成立後「師法俄國」的時期，學習以「直接教學」為主要形式的集體主義教育模式；第四次是改革開放後，沐浴歐風美雨的時期，學習以「活動教學」為主要形式的自由主義教育模式；而2006年創新型國家戰略的提出，標誌著中國從博取眾長走向自成一派的改革道路，這同時也標誌著中國學前教育改革進入新的戰略調整期中國學前教育目前正在努力超越「生搬硬套」的時代，進入到自主發展性學習階段。在這個階段，吸取借鑑各國先進經驗，自主發展有中國特色的學前教育成為主要特徵。

關鍵詞：學前教育、模仿、創新、中國模式

* 霍力岩，北京師範大學學前教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所長

** 李敏誼，北京師範大學學前教育研究所講師、碩士生導師，博士
電子郵件：liyanhuocn@126.com；lmycherry@126.com

來稿日期：2010年1月20日；修訂日期：2010年2月10日；採用日期：2010年3月2日

The Centennial Change from Imitation to Innovation : A Strategic Adjustment in the Reform of Chinese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Li yan Huo^{*} Min yi Li^{**}

Abstract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ECE) has made a long reform from imitation to innovation that lasted almost one century. It included four stages: the first and the second were a learning process from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third was a copy of the Soviet model with collectivist education and direct instruction, while the fourth was rather American and European liberalism. Only since 2006 a new strategic adjustment aimed at building up an innovation has been mapped in order to modernize the country. Accordingly, the Chinese ECE has to find a new way of innovation, i.e. the Chinese way, which may be able respond to the global world and to the needs of the Chinese.

Keywords: ECE, imitation, innovation, China model

^{*} Li yan Huo, Professor, Doctor Advisor and Director of Early Childhood Research Institut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 Min yi Li, Lecturer and Master Advisor of Early Childhood Research Institut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E-mail: liyanhuocn@126.com; lmycherry@126.com

Manuscript received: January 20, 2009; Modified: February 20, 2010; Accepted: March 2, 2010

壹、前言

1903年，湖北巡撫端方在武昌閱馬場尋常小學堂內設立了中國第一所學前教育機構——湖北幼稚園，聘請東京女子高等師範畢業的戶野美知慧等三名日本教師任教，首開中國幼兒公共教育的歷史先河，同時也引進日本福祿貝爾式幼兒園的理論與實踐（田景正，2005）。1904年一月，清政府頒布《奏定學堂章程》，定幼兒教學機構為蒙養院，隨後北京、湖南、江蘇、上海等地的蒙養院誕生。如果從1903年算起，我國學前教育已走過了一百多年的發展歷程。可以說，一百多年來，國外學前教育理論與實踐深刻影響了我國學前教育的價值取向與路徑選擇，這是一個從模仿到創新的百年探索歷程，其中經歷了多次大規模的戰略調整。

本文試圖通過回顧百年來我國學前教育經歷的四次大規模向國外學習浪潮，重溫我國學前教育百年所走過的真實而曲折的發展歷程，還原新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歷史演變進程中，中國學前教育和中國學前教育工作者鍥而不捨、實事求是的求真探索。並在此基礎上本文希望探索2006年創新型國家戰略的提出促使我國學前教育研究者重新思考改革路向，從模仿走向創新的戰略調整期的到來促使學前教育改革必須走向全球化和民族化相結合的道路。

貳、從師法日本到全盤「美」化：學前教育被迫啟動改革進程

自從1840年鴉片戰爭清朝慘敗後，長期以天朝上國自傲的中央之國知道自己技不如人以及狂妄自大。一部分士大夫也「開眼向洋看世界」，開始向西方學習，「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中國也不情願地被拖入了世界體系，並開始現代化改革之路。甲午戰爭中國全面敗北，泱泱大國竟不敵以前的一個小屬國，大清朝開始對日本現代化之路產生濃厚的興趣。後來日俄戰爭，日本出人意料地打敗了沙俄，更是讓滿清刮目相看。「師法日本」便成為晚清改革的主要思想傾向。戊戌變法和清末「預備立憲」，都以日本為示範樣板。

就教育而言，情況也是如此。1902年壬寅學制、1903年癸卯學制、1912年壬子學制、1913年壬子癸丑學制，這些清末學制幾乎完全抄自日本。這個時期的學前教育改革，也是以日本為藍本的。當時蒙養院制度儘管確立了，但是師資嚴重缺乏，引進日本教習培訓師資或由其自接充任蒙養院保姆成為當時解決幼教師資問題的重要形式。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興起，歐風美雨一時蓋過了「師法日本」。胡適提出「全盤西化」的主張，請來其在美國的指導教授杜威（John Dewey，1859-1952）和英國哲學家羅素（Bertrand A. W. Russell，1872-1970）來中國巡迴講學。就教育而言，情況是全盤「美」化，1922年的壬戌學制便是在此歷史背景下應運而生的。據記載（Zhou, 2005），二十世紀二〇年代在世界教育研究重鎮——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學習過的中國留學生多達160多人，而同期「哥大」師範學院學生總共5,000多人。陶行知（1891-1946）、胡適（1891-1962）、蔣夢麟（1886-1964）、張伯苓（1876-1951）、郭秉文（1880-1969）、張彭春（1892-1957）、陳鶴琴（1892-1982）等均在該校學習過。這批留學生所修學科有教育哲學、教育史、教育行政、教育統計、鄉村教育、家事教育、師範教育、教育心理學等，幾乎囊括現代教育的所有學科。這些中國留學生回國以後，成為推進中國教育現代化建設的「第一推動力」。

但是，部分留美學者在回國參與教育實踐後開始反思全盤西化，開始嘗試中西融合的教育探索之路。例如中國化學前師範教育的探索中，有突出貢獻的是「南陳北張」所主管的北平幼兒師範學校和江西省立實驗幼兒師範學校。1930年，熊希齡成立北平幼兒師範學校後，聘請張雪門主持校務。張雪門決定「自成立一種實驗教法」，將幼兒師範辦成「實驗幼稚新教育之工具」。在辦學方向上，結合國情，不仿美國，不法日本，教育內容避免洋化。辦學既重理論，又重實踐，特別注重實習和社會實踐。江西省立實驗幼兒師範學校於1940年十月成立，它是中國第一所公立單設的幼兒師範學校，該校的創辦是陳鶴琴多年來培養中國化幼教師資的宿願。江西省立實驗幼兒師範學校依據「活教育」理論原則，在幼師課程、教材等方面進行獨到的、中國化實驗探索，理論方面，逐漸形成一系列有特色的符合中國實際的幼兒師範教育理論（田景正，2005）。

對於中國大陸而言，陳鶴琴的理論與實踐對於中國學前教育改革的影響更大。陳鶴琴1919年從美國留學歸來後開始中國化和科學化的學前教育探索

之路。他接受西方的教育理念，但並未趨同於當時國內照抄照搬西方模式的潮流，而且對當時的「抄襲現象」進行嚴厲批判，他（陳鶴琴，1985：1）指出，

我們中國的幼稚園大抵是抄襲外人的，而外人的幼稚園已時有改進，但我們還是墨守成規，不知改良，以致陳舊腐敗不堪聞問了。

陳鶴琴（1985：8）繼續表示，

幼稚園這種教育機關，在中國本來是沒有的。現在我們既然來創辦這件事，就應當先自己問一問，用什麼目標，怎樣的辦法。倘是一些主張都沒有，仍舊像中國初辦教育時候，今日抄襲日本，明日抄襲美國，抄來抄去，到底弄不出什麼好的教育來。

他積極實踐與探索一條適合中國國情和本民族特點的科學的幼兒教育發展道路。陳鶴琴率先研究中國兒童的心理和發展規律、家庭教育及幼稚園課程和教育，1923年創辦我國第一個幼教實驗中心——鼓樓幼稚園，開創幼教科學研究的先河。1940年籌建江西省實驗幼兒師範學校，全面實驗其「活教育」的思想，以實驗其辦中國化幼兒教育，由中國人自己培養中國化幼教師資的宏願。1947年，在上海逐步整理出活教育的理論體系。此外，陳鶴琴還提出編制幼稚園課程的十大原則、九項內容、五項活動以及三種編制方法，建立較為完善、系統的課程論（陳鶴琴，1985）。二十世紀二、三〇年代至新中國成立之前，陳鶴琴的教育思想基本得到了普及。

參、學習蘇俄：幼兒園裡開展「直接知識教學」和「集體主義教育」

一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Под Московные вечера），曾被幾代中國人傳唱；一本《鋼鐵是怎樣煉成的》（Как закалялась сталь），曾讓一代人生命不息，奮鬥不止；一部和《列寧在1918》（Ленин в 1918 году）一樣流傳甚

廣的教育電影《教育的詩篇》，更激發無數新中國的教育工作者對教育事業的無限熱情。蘇聯歌曲、書籍和電影在中國的廣泛傳播，正是新中國成立後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全面「師法俄國」的真實寫照。

前蘇聯及蘇聯教育思想對中國的影響，最早可以追溯到五四運動以前，而新中國成立伊始，由於西方國家的封鎖，加之缺乏建設社會主義的經驗，我國發展走上全面「師法俄國」的道路。在這段時期，我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及教育事業建設等各個方面都受到了前蘇聯的極大影響。

在經濟與政治結構全方位模仿、借鑑蘇聯的環境中，新中國的教育也不例外。學習蘇聯的教育制度、教育理論和教育經驗幾乎成為新中國教育工作者向外國學習的唯一任務，蘇聯也成為令中國教育工作者最為敬仰和崇拜的先進國度。這一時期，凱洛夫（N. A. Каиров, 1893-1978）、贊可夫（Л.В.Ванков, 1901-1977）、克魯普斯卡雅（Надежда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 Крупская, 1869-1939）、馬卡連柯（Антон Семенович Макаренко, 1888-1939）、蘇霍姆林斯基（В. А. Сухомлинский, 1918-1970），等人對中國教育皆產生不容置疑的深刻影響，他們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如指令性課程範式、發展性教學理論、平行主義教育方法、集體主義教育思想、少先隊建設理論、個性全面發展的教育理論和實踐等開始在我國扎根。

五〇年代初，中國開始以蘇聯學前教育思想和理念為藍本的學前教育變革。此次向國外學習的浪潮深刻影響國家和民族命運。中國的學前教育全盤接受蘇聯的學前教育制度、理論及實踐經驗，蘇聯學前教育思想成為中國大部分學前教育者前程追隨和膜拜的對象。在學習蘇聯教育理論和經驗的同時，二、三〇年代發展起來的陳鶴琴教育思想由於對資本主義社會和對杜威的批判而受到牽連並被否定。

有研究者（王春燕，2003）指出，1949至1951年上半年這段時間除了教會辦幼兒園、私立幼兒園在課程上各行其是外，公立幼兒園的學前課程主要是受陳鶴琴的「活教育」理論及單元課程的影響，基本上沿襲舊中國幼兒園課程設置而沒有進行較大的變動。但是由於我國在五〇年代初政治取向上對美國進行抵抗，教育思想領域開始對杜威實用主義教育理論和兒童中心主義進行批判，並由批判電影《武訓傳》波及到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和陳鶴琴的活教育，對陳鶴琴的兒童教育思想以及活教育指導下的單元課程開始逐步進行全盤否定。活教育理論被認為與當時主流教育即新民主主義教育在價值觀上是相悖的（王春燕，2003）。凱洛夫的教育思想逐步取代杜威的教育思想在中國的影響，前蘇

聯強調兒童全面發展與系統知識的分科教學模式逐漸取代陳鶴琴的強調兒童中心的單元教學模式。這種對「活教育」和單元教學的簡單否定中止新中國學前教育的獨立探索道路，為中國學期教育的發展帶來負面影響。

大陸資深的課程研究專家朱家雄（2003）指出，在歷時30載的建國後第一波向國外學習的浪潮中，我國學前教育界向前蘇聯學習一套以「直接教學」和「分科教學」為主要特點的集體主義教育模式。1950年九月，蘇聯幼稚教育專家戈琳娜被聘為中央教育部幼稚教育顧問，1954年，由馬弩依連柯繼任。兩位元幼教專家定期參與教育部對全國幼稚教育情況分析工作，赴上海、天津、南京等地對幼兒師範學校和幼稚園工作進行考察指導，並在北京師範大學開設講座。蘇聯幼教理論和經驗在我國得到系統而廣泛的傳播，主要表現為引進了「作業」，通過作業對幼兒進行系統的教學（中國學前教育研究會，2009）。

此外，克魯普斯卡雅和烏索娃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得到廣泛傳播。克魯普斯卡雅認為集體主義教育是共產主義道德教育的重要內容之一。她認為蘇聯的教育方法和資本主義國家的教育方法的根本區別就在於

資產階級力圖把兒童培養成個人主義者，……我們卻努力把我國的兒童培養成集體主義者。（引自吳式穎，2006：39）

個人主義者把「我」置於一切之上，他們與群眾對立起來；而集體主義卻將自己置於群眾之中，視自己為集體的一部分力量。克魯普斯卡雅將學前教育視為國家的事業和整個國民教育體系中一個不可或缺的環節；號召廣泛地發展學前教育，採取各種措施擴大托兒所、幼兒園和幼兒教養場所，並在列寧的指示下進行了蘇聯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大規模擴展學前教育機構網的工作（引自雷克嘯，1985）；在教育人民委員部成立學前教育處並直接領導該處的工作，主持制訂《幼兒園規程》、《幼兒園教養員工作指南》等手冊，其皆成為中國學習的範本。

克魯普斯卡雅、烏索娃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得到廣泛傳播、學習和實踐的同時，當時在中國學前教育領域還未被深入瞭解的西方學前教育思想與實踐受到了批判。譬如，我國學前教育工作者批判了蒙台梭利（Maria Montessori，1870-1952）以及她作為「資產階級教育代言人」的「兒童中心思想」和「自由主義教育思想」，並形成一套與以蒙台梭利為代表的西方學前教育模式決裂的、與中小學的「直接教學」和「分科教學」模式類似的集體主義教育模

式——在烏索娃「學前教學」思想與蘇聯學前教學實踐的影響下，「教學」這個概念被引入我國學前教育領域，我國紮紮實實開展了30年「學前教學」實踐。我國的幼兒園教育拋棄以往的課程建設，而是被劃分為學科，通過割裂的各科教學來實現幼兒園教育。可以說，蘇聯學前教育家烏索娃主導的「學前教學」——「直接教學」「分科教學」的集體主義教育模式，在相當程度上成為改革開放之前我國幼兒園教育教學的主旋律。我們不僅編寫幼兒園教學大綱、分科直接教學的教材和參考資料，還培養一大批擅長分科直接教學的教師，目標明確、內容系統、可操作性強的分科教學有利於我國在成立之初的整頓和恢復時期對教育進行自而下的層級管理，利於維持教育教學正常的秩序。可以說，在新中國成立後的前30年，中國的廣大幼兒園都在實踐著這套深受前蘇聯影響的分科直接教學的集體主義教育模式。

肆、借鑑歐美：幼兒園裡開展「主題活動教學」和「兒童中心教育」

二十世紀七〇年代末開始，我國進入全面改革開放時期，對內改革、對外開放，逐步面向全球化，融入世界潮流。教育作為國家改革和發展的重要成分，也在向國外學習的浪潮下開始新一輪的改革。二十世紀七〇年代末期以來，中國掀起之向國外學習的第二波浪潮的對象是美國和歐洲的資本主義國家。

從二十世紀八〇年代開始，改革開放的春風吹響了向西方學習的號角。我國早期教育界在反思蘇聯分科教學模式的基礎上，大量引進西方先進教育經驗，特別是美國的早期教育課程模式。我們向美國的蒙台梭利教育法（Montessori method）、皮亞傑（Jean Piaget, 1896-1980）的認知課程、多元智力理論（multiple intelligences）指導下的光譜方案（project spectrum）以及瑞吉歐教育法（Reggio approach）等早期教育課程模式敞開「大門」。學前教育界像虔誠的唐三藏一樣，孜孜不倦、不畏艱難地開始了「向西天取經」的歷程。這30年改革歷程有三次標誌性的事件，那就是三次國家層面的「指導綱要」或者「工作規程」的出台。在此基礎上，實踐界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

1981年10月31日，教育部頒發《幼兒園教育綱要（試行草案）》（以下簡

稱《綱要》) (教育部, 1981; 引自中國學前教育研究會, 1999)。《綱要》包括三方面的內容：第一部分規定幼兒的年齡特徵與教育任務。例如《綱要》宣導「幼兒園的教育任務應是向幼兒進行體、智、德、美全面發展的教育，使其身心健康活潑地成長，為入小學打好基礎，為造就一代新人打好基礎」，「使幼兒的智力、才能和個性生動活潑主動地得到發展」，「要熱愛幼兒，尊重幼兒」，「要面向全體幼兒，既有統一的要求，又要因材施教」。第二部分規定教育內容和要求。提出幼兒園是通過遊戲、體育活動、上課、觀察、勞動、娛樂和日常生活等各種活動進行教育。

1989年6月5日和8月20日，國家教委先後頒布《幼兒園工作規程（試行）》（以下簡稱為《規程》）與《幼兒園管理條列》（國家教育工作委員會，1989；引自中國學前教育研究會，1999），並於1990年2月1日起實施。

《規程》分為十章，分別是總則，幼兒園的招生、編班，幼兒園的衛生保健，幼兒園的教育，幼兒園的園舍、設備，幼兒園的工作人員，幼兒園的經費，幼兒園的管理工作和附則。《規程》在「幼兒園的教育」一章中提出「以遊戲為基本活動，寓教育於各項活動之中」、「幼兒園的教育活動是有目的、有計劃引導幼兒主體活動的，多種形式的教育過程。」、「注重培養幼兒良好的個性心理品質」，對培養幼兒的動手能力、運用感知與語言交往的能力、探索精神及幼兒的情感、個性品質等，這些都是《綱要》所沒有提出的要求。1996年3月9日，國家教育委員會發布《幼兒園工作規程》，充分肯定八〇年代幼兒園課程改革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並為改革指明方向，為《幼兒園教育指導綱要（試行）》的制訂奠定一定的基礎。

2001年九月，教育部（2001）頒布實施《幼兒園教育指導綱要（試行）》（為了和1981年的《綱要》有所區別，以下簡稱為新《綱要》），新《綱要》分為四個部分：總則、教育內容與要求、組織與實施、教育評價。第一部分主要指出早期教育的性質和任務以及幼兒園教育應該注意的一些問題。第二部分明確幼兒園的教育內容是全面的、啟蒙性的，相對劃分為健康、語言、社會、科學和藝術等五大領域，分別規定五個領域的不同目標、內容與要求以及指導要點。第三部分規定幼兒園教育內容組織與實施以及應該注意的一些事項。第四部分指出教育評價是幼兒園教育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指出評價的作用、評價的主體、評價的性質、評價的方法、評價的注意事項以及評價的標準等。實際上，我們在新《綱要》中就可以看到四個部分分別對應教育目標、教育內容、教育方法和教育評價等四個課程要素。

從《綱要》到《規程》再到新《綱要》，在中國社會急速轉型的過程中，中國早期教育希望通過學習西方，走向現代化的課程改革歷程變得清晰可見。總的來說，二十世紀八〇年代以來三次課程改革的特點和轉變可以歸納如下：第一，分科課程一統天下的局面被打破，多元化的課程格局逐步形成。第二，課程關注的重心由「重物」轉向「重人」；由「重教師」轉向「重兒童」，實現課程價值取向的根本性轉變。第三，課程內容取向由「靜態的」知識向到「動態的」活動轉變。第四，課程實施途徑由單一的「上課」向多種多樣的的教育活動轉化。第五，課程評價取向由「重結果」向「重過程」轉化（石麗娟，2003）。

在這一重要改革時期，我國學前教育工作者開始積極學習和借鑑歐美的學前教育制度、理論和實踐經驗。陳鶴琴和陶行知等人的教育理論也再次受到重視，

我國幼教理論和實際工作者對我國幾十年的幼兒園課程進行了反思，對陳鶴琴等編制的單元教學作了重新評價，並對杜威的教育理論進行再認識。（王春燕，2003：前言6）

我國學前教育界在對陳鶴琴和陶行知等人的學前教育思想進行重新審視和探討的基礎上，向歐美學習以「活動教學」和「綜合教學」為主要特點的自由主義教育模式。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當之前學前教育界在與以前蘇聯為代表的「直接教學」、「分科教學」的集體主義教育模式站在同一陣營的同時，也和今天學前教育界學習和借鑑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活動教學」、「綜合教學」的自由主義教育模式劃清界限，或至少保持相當距離。

在第一波向國外學習的30年間，少有中國學前教育工作者在中國的土地上嘗試開闢「區域活動」教學的試驗田，儘管當時它已經在國際學前教育領域紮根並茁壯成長；少有中國學前教育工作者在中國的舞台上嘗試出演「綜合主題教學」的新劇種，儘管它已經在世界學前教育舞臺上上演了半個世紀而不衰。如同我們不知道市場經濟並非資本主義的專利一樣，我們並不知道現代教育有社會主義教育和資本主義教育兩種完全不同的教育形態（顧明遠，2007）。學前教育界以前蘇聯的學前教育制度、學前教育思想和學前教育模式為學習物件，以向前蘇聯學習為榮。學前教育界相信集體主義教育模式是絕對真理，學前教育界把學習前蘇聯的集體主義學前教育模式並以它為基礎建設我國的學前

教育模式看作是學前教育界的理想和追求。

改革開放以來的30年，學前教育界學習和借鑑的是與前蘇聯以「直接教學」和「分科教學」為主要特點的集體主義教育模式截然不同的學前教育模式，是西方的「活動教學」和「綜合教學」的自由主義教育模式，如高瞻教育方案、蒙台梭利教育法、瑞吉歐教育方案和光譜教育方案等。在西方多種多樣的自由主義教育模式中，在西方兒童多種多樣的自由活動中，有研究者發現西方學前教育模式不同於前蘇聯學前教育模式的特點：

「從現象上看，這種教學方法是自由主義的」，但「在自由中卻蘊含著計劃性、目的性」，「設計環境是教師最重要的工作。教室的環境如何布置，選擇什麼玩具和遊戲，都要經過精心設計」，因此，對於教師來說，「自由教學並不自由」。（顧明遠，2007：195-196）

換言之，在西方的學前教育機構中，自由教學就是兒童在教師精心提供的環境中的自主學習，是兒童對教師精心設計的環境和認真製作的材料的自由探索。而表面上看來沒有直接教學任務的教師，實質上是環境的創設者，是兒童探索環境時的觀察者、引導者和研究者。學前教育界開始漸漸懂得，原來，學前教育既需要借鑑前蘇聯的分科直接教學模式，也需要融入西方的在活動中對兒童進行「潤物無聲」教育的模式；原來，教師不單要在教室中「眉飛色舞」地「滔滔不絕」，還要在教室以外體現功力；原來，「此時無聲勝有聲」的活動教育「才算是對兒童真正的愛」；原來，對兒童真正的愛不只是一個方法問題，更是一個教育觀的問題、人才觀的問題，這是顧明遠（2007）在他自己的教育口述史中的感言。

2001年，教育部（2001）頒布《幼兒園教育指導綱要（試行）》，注重兒童體、智、德、美諸方面的全面和諧發展，指出

幼兒園的教育內容是全面的、啟蒙性的，可以相對劃分為健康、語言、社會、科學、藝術等五個領域，也可作其他不同的劃分。各領域的內容相互滲透，從不同角度促進幼兒情感、態度、能力、知識和技能等方面的發展。（教育部，2001）

這種綜合領域課程與陳鶴琴當年提出並實施的五指課程有很大的相似性。

陳鶴琴先生打破學科編制的幼兒園課程方式，以大自然、大社會為中心選擇和組織課程內容，形成他所謂的「五指課程」，包括健康活動、社會活動、科學活動、藝術活動以及語文活動。他指出，

五指是活的，可以伸縮，互相聯繫，課程是整個的，連貫的。依據兒童身心發展特點，五指活動在兒童生活中結成一個教育的網，有組織有系統，合理地編制在兒童的生活上。（引自朱家雄，2003：305）

可以看出，我國新一輪的學前教育課程改革是以西方學前教育模式和陳鶴琴先生的教育思想為依據的。總而言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學前教育的現代化進程在相當程度上受到西方現代價值觀的影響，我國學前教育改革與發展的進程開始反映以西方現代教育理念為代表的價值觀，我國學前教育開始被打上西方文明和西方價值觀的烙印。如果我們把眼光重點放在建國後學前課程的改革，那麼我們可能會有以下發現：

回溯早期教育課程近百年發展歷程及三次重大的課程改革，會發現：在知識觀上，由經驗主義走向理性主義，並趨向以建構主義為主的知識觀；在價值取向上，以兒童為本位向社會需要為主轉變，並走向注重兒童本位的同時兼顧社會需要；在兒童觀賞，從「熱愛兒童，尊重兒童」向「一切為了孩子，一切為了生產」轉變，再發展為「愛護兒童，教育兒童，保護兒童的最大權益」；在師幼觀上，從朋友式向「以教師為主導，兒童處於被動」轉變，發展為「兒童式教育的主體」；在課程模式上，從單元活動課程為主向學科課程轉變，發展為多種課程模式並存；而早期教育課程整體變革經歷了「自下而上——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螺旋式發展道路。（牟映雪，2004：235-236）

改革開放以來的三次學前教育改革與調整，以西方各種先進的教育理論為自己的指導思想，但是缺乏自己的理論基礎，致使在改革過程中，出現理論與實踐相背離的現象，而且改革過程中不注重經驗的總結，求新求快，急功近利的特點較為突出。三次課程改革的指導思想越來越接近世界學前教育改革的主旋律，指導思想更加成熟，更加具有時代感，但是離具有中國特色之學前教育課程理論的最終形成還有一段距離。

伍、從博取眾長到自成一派：創新型國家戰略下學前教育改革方向的調整

國人平均國內生產總值突破1,000美元（折合新台幣約33,000元），經濟總量躍居全球前列，工業化、城鎮化、市場化、國際化進程明顯加快，社會主義各項事業順利推進……步入新世紀的中國，站在一個新的歷史起點，處於一個關鍵的發展時期。國家主席胡錦濤於2006年1月9日在全國科技大會上宣布中國未來15年科技發展的目標：2020年建成創新型國家，使科技發展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有力支撐。這是國家戰略的重大調整，也是中國從被動全球化到主動全球化的一個重大轉捩點。中國的現代化和崛起，不應只是重複過去崛起大國的軌跡和邏輯，也不應僅站在本國與本民族的高度，而必須是從歷史和人類共同的高度出發；只有這樣，崛起的中國才能為人類帶來更多的精神價值和財富，也才能更多地為世界所接受。

因此，增強自主創新能力亟需推進教育創新。根據教育部（2007）的統計資料，1985—2006年，我國教育人口從2.3億人飆升到3.3億人，教育人口比重從22%上升到25.6%。改革開放30年來，各級各類教育快速發展，有力地提升中國的人力資源水準。文盲人口顯著減少，國人平均受教育年限不斷提高，受過高層次教育的人口比例不斷提升，這些都使國民受教育水準和人力資源水準得到快速的提升。推進教育創新，就需要大力培養創新型人才，不斷推進知識與技術創新和創新文化建設，著力培育國民創新精神。這樣中國才能真正從人口大國轉型成為人力資源大國。面向未來，中國學前教育應該選擇怎樣的發展道路？

回顧中國現代學前教育的發展史，就是一部學習外國先進教育經驗的歷程。再綜觀百年年來中國學前教育的改革與發展，本文作者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國學前教育在多次向國外學習的浪潮中曲折前行和漸進發展，是曲折性和漸進性的有機統一。以新中國成立60多年來的學前教育改革為例，毋庸置疑，在第一波向前蘇聯學習的浪潮中，不容動搖的價值取向和堅持不懈的實踐步伐所形成的思維定勢、行動定勢等習慣勢力，是學前教育界今天學習和借鑑西方學前教育模式時必須面對的慣性阻力。新中國成立以後的前30年時間裡，學前教育界主要依據前蘇聯的集體主義教育模式，形成了一套課程理念和課程行為體

系，形成一套從國家到地方支持這種課程理念和課程行為體系的培訓和保障體系。

即使八〇年代以來的我國幼兒園課程改革直接針對學科課程體系，學前教育者們也針對學科課程提出諸多批評並積極實踐和探索各種新型的自主性多元化的課程，這種傳統的學科課程在幼兒園教育實踐中仍占據重要地位。所有這些確實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改變的。改革開放30年來，西方學前教育思想大量湧進中國，學前教育界同時學習和實踐幾套西方的學前教育模式，試圖突破已深入骨髓的傳統學前教育模式，想一下子掌握多種另一種文化背景下的學前教育模式，而且急功近利地希望在短時間內掌握每一種西方的學前教育模式，那麼，每種模式淺嘗輒止，拿來就用，學完了丟，丟完了又學，卻不去深入研究，最後導致任何模式都掌握不了的結局就在所難免。

應該說，西方的一些優秀學前教育模式，如高瞻教育方案、瑞吉歐教育方案和光譜教育方案等，因其品質優秀、實踐性強等特點，已經成為影響我國學前教育改革與發展的一股勢不可擋的課程改革潮流。但是，反思改革開放30年來學前教育界學習和借鑑多種西方學前教育模式的真實狀況，學前教育界的學習思路、借鑑原則、實踐歷程、實踐方式等並不讓人樂觀：在「活動學習」中拉開序幕，「蒙台梭利」成為了再次選擇，「瑞吉歐」讓我們從頭再來，「多元智慧」要我們再回起點……或許，再過幾年，我們又會對多元智力理論及其光譜教育方案提出質疑，然後又面朝西方尋找新的、「更好的」學前教育課程模式……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二十世紀八〇年代以來，我國學前教育課程改革走了一條學習西方學前教育課程模式的發展道路，在各種模式間徘徊和打轉，卻為想過要有所突破。我們何時才能結束對西方學前教育模式的盲從和膜拜？我們何時才能形成擁有國際視野的、能與全球學前教育對話的、讓世人信服的我們自己的優質學前教育課程模式？

實際上，課程模式本身是開放的，各種課程模式都在「博取眾家之長」，衝突和融合的過程一直都在進行。而我們對各種課程模式的追求只是疲於奔命，引進了新的課程模式之後就直接用了再說，缺乏對於這種課程模式的深入思考以及有效整合和本土化的研究。現階段，中國學前教育課程改革實踐面臨的一個最大的問題，那就是如何落實《幼兒園教育指導綱要（試行）》。這個階段必須在模仿的基礎上有所創新。那就是說，我們實踐界迫切需要一份、甚至是幾份的學前教育課程模式作為藍本，從描摹開始、對源自歐美的學前教育課程模式進行創造性的繼承和創新。九〇年代，

課程內容價值取向的多元化格局形成，並有相互吸納的趨勢。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出現了中國的四大學前課程模式，即綜合課程、活動課程、遊戲課程和領域課程。（石麗娟，2003：33）

堅持用歷史的、發展的觀點來闡釋學前教育改革與發展的百年歷程，把今天的學前教育改革放到新中國學前教育改革與發展的來龍去脈和起承轉合中去認識，放在新中國學前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歷史傳統和現代化進程中去說明，我們才可以看到，新中國學前教育的起點和新中國學前教育走向現代化的歷史進程，即發展的階段性和連續性之有機結合，發展的曲折性和漸進性之有機結合；我們也才需要反思建國以來學習和借鑑前蘇聯模式和西方模式的曲折歷程，回首改革開放以來學習和借鑑多種西方學前教育模式的真實狀況，正視當前學習與借鑑歐美學前教育模式中出現的實際問題；我們也才能夠理性思考今後一段時期和未來相當長一段時期，我國學前教育改革與發展的價值取向、道路選擇、行動範式和前進節奏。

陸、立足中國，放眼世界，走向全球化 與民族化的學前教育改革

在向國外學習的過程中，急功近利的心理和對國外教育理論的盲目崇拜，造成我們對國外學前教育思想的全盤接受。五〇年代初學習蘇聯時如此，改革開放初我國學前教育又陷入「全盤西化」的窘境。全面學習蘇聯時期，我們放棄了陳鶴琴等教育家正在努力探索的一條新的中國化科學化的學前教育之路；新一輪向西方學習的浪潮中，西方的理想化由於改革開放和現代科技的功用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化和普及，而我們卻還缺乏對它們的深入瞭解與分析，這種全盤接受所帶來的負面影響都已逐漸凸顯出來。陳鶴琴先生在二十世紀二〇、三〇年代就針對中國學前教育的美國化時說過：

現在中國所有的幼稚園，差不多都是美國式的……這並不是說美國化的東西是不應當用的，而是因為兩國國情上的不同。有的是不應當完全模仿的，儘管在他們美國是很好的教材和教法，但是在我國採用起來到底有許多不妥當的地

方。要曉得我們的小孩子不是美國的小孩子，我們的歷史、我們的環境均與美國不同，我們的國情與美國的國情又不是一律，所以他們視為好的東西，在我們用起來未必都是優良的。（陳鶴琴，1991：110-111）

趙寄石教授在邁入二十一世紀初始時，回顧中國建國以來學前教育事業風雨兼程的學習歷程時也講道：

在我國學前教育的發展史上，長期存在著要麼「全盤照抄」，要麼「全盤否定」外國幼兒教育的兩種極端做法，使我國的幼兒教育走了許多彎路。改革開放的初期，受追「新」思潮的影響，一些外來的、許多人還一知半解的東西又被不加分析地全盤認可。這種學完了丟，丟了又學的惡性循環使幼教改革再一次走入了誤區。（引自薛生，2001：4）

中國學前教育工作者學習和借鑑多種外國學前教育模式的迫切性，說明瞭我們對優質學前教育模式的渴望與追求，也說明瞭我們對自己沒有優質學前教育模式的悲哀和無奈，更說明瞭我們在學習和借鑑外國學前教育模式時，因缺失了對這些學前教育模式的時代烙印和民族特色的深刻理解，在對這些模式的推崇中陷入了漏讀、誤讀和誤用的「怪圈」，有意或無意地走入了誤區。

杜威當年在中國演講的時候曾經對中國渴望通過學習外國強盛民族和國家的心情表示瞭解，但是他語重心長地提示說：

一國的教育決不可胡亂摹仿別國。為什麼呢？因為一切摹仿都只能學到別國的表面種種形式編制，決不能得到內部的特殊精神。況且現在各國都在逐漸改良教育，等到你們完全摹仿成功時，他們早已暗中把舊制度逐漸變換過了。你們還是落後趕不上。所以我希望中國的教育家一方面實地研究本國本地的社會需要，一方面用西洋的教育學說作為一種參考材料，如此做去，方才可以造成一種中國現代的新教育。（引自趙祥、王承緒，1981：443）

所謂「本國本地的需要」無疑和文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教育歷來與社會文化背景相聯繫。一定社會的教育從來都由一定社會的要求和一定社會中兒童發展的實際決定。歷史上、國際上從來就不存在獨立於社會生產水準和社會意識形態之外的教育。正如最新版本的《三種文化中的學前

教育》一書所說，

學前教育體系既反映了隨著時間流逝而固有的文化價值觀，同時也反映了面對社會壓力以及社會對於兒童的要求和期待所作出的變革。（Tobin, Hsueh, & Karasawa, 2009: 1）

東、西方的學前教育模式都是一定社會文化的產物，是一定社會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在人類幼年教育中的具體體現。所以，這種在異域環境中生成的教育教學模式被賦予特定的環境特徵和要求，試圖將其移植到他國，而不加分析研究就全盤接受是行不通的。

顧明遠曾經在《中國教育的文化基礎》一書中尖銳地指出：

教育有如一條大河，而文化就是河的源頭和不斷注入河中的活水，研究教育，不研究文化，就知道這條河的表面型態，摸不著它的本質特徵，只有徹底把握住它的源頭和流淌了5000年的活水，才能徹底地認識中國教育的精髓和本質。（顧明遠，2004：前言1）

因此，如果我們不研究中國國情，盲目學習肯定會走進死胡同。馮友蘭也曾經批評這種現象，他說：

當中國和西方接觸的初期，先進的人們覺得有一點是他們所熟悉的，他們覺得西方各國的並立和紛爭很像中國的春秋戰國時期。在這種情意下，他們不免用中國的歷史去套西方的歷史，用中國的理論去套西方的理論。（馮友蘭，1989：125）

他（馮友蘭，1989）還指出，在現代革命時期，還存在從西方文化的觀點看中國傳統文化，用西方文化的模式去套中國傳統文化。「橘生淮南則為橘，橘生淮北則為枳」，自然界尚且如此，更何況較之自然界複雜千百倍的人類社會呢！教育理論和模式脫離了適應其生長和發展的土壤，必定不復以往的生機與活力。

只有用一種健康的心態去重新閱讀西方，我們才能深入理解外國教育理論，沿著這些學前教育模式本身的發展脈絡去解讀，才能深入考察這些模式之

間的異同之處和矛盾所在，才能知其利弊得失所在，才能形成自己權衡取捨的廣闊視野——立足中國，放眼世界，才能兼顧民族性與時代性。我們應該建設與時代相適應的、與我國傳統文化特點碰撞並融合的、有鮮明民族特色或民族風格的學前教育體系，並使其能夠體現一個擁有幾千年優秀文化傳統的東方民族在全球化時代所具備的時代性和民族性特點。特別值得指出的是，這個具有鮮明民族特色或民族風格的學前教育體系應能表現出中華民族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對學前教育的新認識，應能表現出對培養創新型人才、建設創新型國家、全面提高中國華民族原創力的新呼喚。這是一種根植於中國學前教育的全球教育觀，是一種全球化時代的民族教育觀。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也只有先是民族的再是世界的，才能使其永保生機，保有生命的源泉。只有成為我們中國人自己，釋放我們自己的教育思想和理念，而不是跟在西方人後面，我們才能對世界做出原創性貢獻，在多元文化的世界大家庭中占據我們應有的位置。

我們從來不是狹隘的民族主義者，但作為中國的學前教育工作者，我們應該努力回應正在走向世界的中國對民族精神的呼喚，對有別於西方價值觀的中華民族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和榮辱觀的呼喚。而所有這一切，都要求我們在學前教育這個終生教育的奠基階段把價值教育、公民教育等工作做實做好。由此，儘快形成具有原創意義之帶有時代烙印和民族特色的學前教育理論和實踐模式，及儘快形成具有理論和實踐創新精神的學前教育話語和行為，不僅應該成為中國學前教育工作者在新時代的理性選擇，更應該成為在新的起跑線上的現實行動。

如果說自新中國成立起的60年是我國學前教育在學習和借鑑外國學前教育中變革與發展的60年，那麼，建國60年後的今天，我國學前教育應該做出的理性選擇是走出一條全球化時代的民族化道路，開啟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的練內功、求卓越的形成自主品牌的新階段，進入建設中國特色、形成中國風格的學前教育理論體系和實踐模式的新時期。

中國學前教育目前正在努力超越「生搬硬套」的時代，進入到自主發展性學習階段。在這個階段，吸取借鑑各國先進經驗，自主發展有中國特色的學前教育的成為主要特徵。以史為鑑，可知得失，我們應吸取歷史成功的經驗。

堅持實踐是橋樑，適合國情是通行證。我們要建立中國特色的學前教育理論，如陳軾眉教授所說，中國特色的學前教育理論應從兩個方面理解：一是符合中國國情的學前教育理論，例如陳鶴琴先生的創造；另一種是由中國人提出的、沒有國界的、符合普遍規律的學前教育理論，這就需要我們進行教育創新

（引自陳幟眉、劉焱，1986）。

我們身處全球化時代，當代中國的前途和命運越來越緊密地同世界各國的前途和命運聯繫在一起。在這樣的時代，我們沒有理由不與世界各國共用優秀教育遺產、優質教育資源和不可多得的歷史機遇，分享世界教育改革的最新成果並和世界各國教育工作者精誠合作。同時，我們也深知，在當今多元化的全球格局中，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依然存在，帶有強烈西方意識型態色彩的價值觀正在通過各種途徑，包括西方的學前教育思潮和實踐模式，影響著中國新一代人的純淨心靈，進而影響著我們整個社會。

與1840年相比，今日中國的國門雖然沒有受到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的威脅，但卻面臨著知識經濟的風雲激蕩和全球經濟一體化強勁浪潮的巨大衝擊。（改革開放30年中國教育改革與發展課題組，2008：36）

因此，正在這樣的背景下，可能我們需要更好地反思如何從「生搬硬套」走向「自主創新」。正如我們思考，如何把全球化與本土化結合，鑄造中國模式。

「從全球著眼，從本地著手」（thinking globally, acting locally）是全球化時代西方十分流行的警句，它說明瞭無論全球化進程有多快，普及程度有多高，我們都必須從一個基本的事實出發，那就是把自己的事情辦好。（李曉東，2003：6）

我們所處的時代要求我們既能放眼世界、具有國際視野，又能聚焦祖國、承擔本土使命，與時俱進、因地制宜地研究中國社會發展和中國教育改革面臨的重大問題和實際問題。由此，如何研發具有我國核心價值觀和民族文化內涵的學前教育理論體系與實踐模型，已經成為我國學前教育界面臨的緊迫而實際的問題。當今時代，文化越來越成為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源泉、越來越成為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因素，豐富精神文化生活越來越成為我國人民的熱切願望。國家提倡要建設和諧社會，這將是一個需要教育參與育人全過程的事情。在新的國際國內形勢下，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我國學前教育工作者有責任、有義務把學前教育看作是關乎和諧社會建設的政治問題和民生問題、價值問題與選擇問題，在中國民族文化所具有的獨特魅力和歷史土壤中，通過我們

自己的努力，創造出新時期的新型學前教育模式，為我國在新的歷史時期和諧教育和諧社會建設提供基本的能源和動力。

百年來，我國的學前教育從不同社會制度下不同的學前教育制度、思想和實踐的碰撞、交融中走來，在基於我國的社會文化背景和現代化建設需要對國外學前教育進行加工、改造和提升中走來。在今日政治多元化、經濟全球化的時代，我們應該開始理性轉變學前教育觀念，建設自己的學前教育模式：以開發中國特色、中國風格的學前教育理論體系和實踐模式為己任，踐履「全球化時代之本土化行動」的學前教育思想創新、制度創新、模式創新和方法創新，建設科學發展觀引領下的學前教育科學發展試驗區和先行地，承擔起為建設中國特色、中國風格的學前教育理論體系和實踐模式先行先試的探路使命。

如果從國際比較的角度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也可以稱作「中國道路」、「中國經驗」或「中國模式」，是中國在全球化背景下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一系列戰略策略。美國著名的未來學家奈斯比特夫婦（John Naisbitt & Doris Naisbitt）在其新著《中國大趨勢》（China's megatrends）（Naisbitt & Naisbitt, 2010）中明確指出：中國在創造一個嶄新的社會、經濟和政治體制，「中國模式」將以難以令人置信的力量影響整個世界。中國模式相對成功帶來的不僅是中國的崛起，而且是一種新的思維、新的思路、甚至可能是一種新的範式變化、一種現有的西方理論和話語還無法解釋清楚的新模式。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的崛起也是中國政治軟實力的崛起，這將對解決中國自己面臨的挑戰、對發展中國家擺脫貧困、對全球問題的有效治理、對國際政治和經濟秩序未來的演變，產生深遠的影響。從不同的理論闡釋和總結中國經驗和中國模式，已經是全世界學術研究熱門話題，中國學者應該做出最重要的貢獻，那將是對人類知識最重要的貢獻。中國百年的學前教育改革，正是在學習外國先進經驗，同時結合本國實際，創造具有中國特色的教育模式中探索前進。作為一名學前教育研究者，我們希望能夠創造自己的教育模式，找到自己的發展步伐，在中國模式的世界意義中貢獻更多的研究力量。

參考文獻

- 中國學前教育研究會（1999）。**中華人民共和國早期教育重要文獻彙編**。北京市：北京師範大學。
- 中國學前教育研究會（2009）。**中華人民共和國幼稚教育60年大事記（上）**。2009年11月15日，取自<http://www.cnsece.com/news/20091115/n37787871.html>
- 王春燕（2003）。**中國學前課程百年發展、變革的歷史與思考**。南京師範大學教育科學學院博士論文，未出版，南京市。
- 北京教育科學研究所（編）（1985）。**陳鶴琴教育文集（下卷）**。北京市：北京教育。
- 田景正（2005）。中國幼兒師範教育的世紀回顧與前瞻。**學前教育研究**，7-8，58-60。
- 石麗娟（2003）。**對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中國學前課程改革的研究**。華南師範大學教育科學學院碩士論文，未出版，廣州市。
- 朱家雄（2003）。**幼稚園課程**。上海市：華東師範大學。
- 牟映雪（2004）。**新中國早期教育改革與發展**。重慶市：重慶大學。
- 吳式穎（2006）。克魯普斯卡雅及其教育思想簡論（譯著前言）。載於衛道治（譯）、金世柏（校），**克魯斯卡雅教育文選**（頁1-47）。北京市：人民教育。
- 改革開放30年中國教育改革與發展課題組（2008）。**教育大國的崛起**。北京市：教育科學。
- 李曉東（2003）。**全球化與文化整合**。長沙市：湖南人民。
- 教育部（2001）。**幼稚園教育指導綱要（試行）**。教基（2001）20號。
- 教育部（2007）。**2006年教育統計資料**。2009年12月12日，取自<http://www.moe.gov.cn/edoas/website18/81/info33481.htm>
- 陳懋眉、劉焱（1996）。**學前教育新論**。北京市：北京師範大學。
- 陳鶴琴（1992）。**陳鶴琴全集（第二卷）**。南京市：江蘇教育。
- 馮友蘭（1989）。**中國哲學史新編（第六卷）**。北京市：人民。
- 趙祥麟、王承緒（編譯）（1999）。**杜威教育論著選**。上海市：華東師範大

學。

薛生（2000）。具有中國特色的探索——趙寄石教授談二十一世紀中國教育改革之路。《早期教育》，1，4-5。

顧明遠（2004）。《中國教育的文化基礎》。太原市：山西教育。

顧明遠（2007）。《顧明遠教育口述史》。北京市：北京師範大學。

Naisbitt, J., & Naisbitt, D. (2010). *China's megatrends: The 8 pillars of a new society*.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Tobin, J., Hsueh, Y., & Karasawa, M. (2009). *Preschool in three cultures: Japa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Zhou, H. (2005). *The spread and impact of Dewey an educational philosophy in China*. Retrieved December 1, 2009, from http://www.tc.columbia.edu/centers/coce/pdf_files/v8.pdf